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伟大的传统

[英] F.R. 利维斯著 袁伟译

The Great Tradition

F.R. Leavis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主编 甘 阳

副主编 苏国勋 刘小枫

[英] F.R.利维斯著 袁伟译

伟大的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

F.R.Leavis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传统 / (英) 利维斯著; 袁伟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2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ISBN 978-7-108-03140-2

I. 伟… II. ①利…②袁… III. 小说—文学研究—英国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867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 50 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 年 6 月于北京

序

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

陆建德

(一)

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 1962年从剑桥大学英文系退休时, 乔治·斯坦纳在《文汇》杂志发表纪念文章说, 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人物(如柯尔律治和托·斯·艾略特)往往也有文学作品传世, 他们既是批评家, 又是诗人, 人们因钦佩他们的诗才而相信他们的判断。凭自身的资格而为后世所敬重的批评家为数很少, 如圣伯夫、莱辛和别林斯基, 利维斯可以跻身于他们的行列。鉴于英美学界当时对利维斯以“利维斯博士”相称, 斯坦纳略显夸张地写道,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位杰出人物使“博士”这平庸的学衔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博士学位, 一个是利维斯博士的, 另一个是约翰逊博士的。”^①与约翰逊博士并

^① 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1967, 企鹅版(哈蒙兹渥斯, 1969), 第232页。

列是极大的荣誉，它同时显示了英国本土批评传统的承继。^①然而利维斯与约翰逊毕竟生活在断然不同的时代：约翰逊热爱伦敦，伦敦的街巷和俱乐部是他活动的天地，利维斯则把伦敦的文学艺术权势集团（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英国广播公司）当作他批评锋镝的靶标。利维斯退休时的心情是不轻松的。那一年他的演讲《两种文化？查·珀·斯诺的意义》在《旁观者》杂志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查·珀·斯诺（C. P. Snow, 1905—1980）既是科学家，又是小说家，而且多年担任政府官员，一身数役，自视甚高。他在1959年一次著名演讲中提出，当代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未来将属于先进的科学文化。利维斯反对“两种文化”的提法，坚持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发了英美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②认可斯诺的说法就意味着间接否定利维斯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对利维斯而言，文学批评是维护并光大文化传统至为重要的环节。

（二）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除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为数不多的短期学术出访，他一生都在剑桥度过，剑桥之于他就像柯尼斯堡之于康德。利维斯从珀斯学校毕业后得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一次大战爆发不久他应召入伍，学业中断。这位英军救护队的担架兵出入

① 佩里·安德森在著名论文《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载《新左派评论》第50期，1968年5月至6月）指出，英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代表都是保守的欧陆移民，由利维斯主导的文学批评几乎是惟一的例外。

② 争论牵涉到如何评价工业革命和“进步”、文学的意义等重大问题。详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1994）；利维斯，《我的剑也不会：关于多元主义、同情和社会希望的演讲》（伦敦，1972）。

于炮火之间，口袋里总有一本袖珍弥尔顿诗集为伴。^①也许因为战争的场面无比惨烈，利维斯后来极少谈及那段时期的经历。停战后利维斯回到剑桥，为准备本科生必需的两次考试（Tripos）主修了历史和英国文学。他取得学位后继续深造，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但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唐宁学院院士，翌年又被剑桥英文系聘为讲师，此时他主办的《细察》（*Scrutiny*）（1932—1953）杂志已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一批忠实的读者。创办《细察》是利维斯对英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

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与文学相关的期刊不少，但主要致力于文学批评的杂志难得一见。利维斯对只维持了两年多的《现代文学记事》（1925—1927）评价极高，《细察》想完成的就是《现代文学记事》未竟的事业^②：以严格独立的批评体现一种标准，从而培养读者的识别力。利维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细察》。

瑞恰兹和他的学生燕卜苏都是禀赋特异之人，但他们未能在剑桥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流派。20年代的剑桥英文系无疑属于瑞恰兹，他在学生心目中几乎是宗教领袖般的人物，他采用心理学视角和新颖的授课方式，课堂总是人满为患。^③瑞恰兹在出版了划时代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和《实践批评》（1929）后赴北京讲学，其后又去哈佛任教；燕卜苏的《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为他赢得天才的美誉（当时他仅24岁），但他也到日本、中国教授英

① 利维斯后来却以批判弥尔顿的“宏伟风格”著称。

② 《现代文学记事》有一组系列文章取名“细察”，主编艾吉尔·里克沃德编过两卷批评文集，书名又是《细察：多人合集》（*Scrutinies by Various Writers, London, 1928—1931*）。利维斯曾从《现代文学记事》编选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批评的标准》（伦敦，1933）。

③ 详见卢本·布鲁厄等编《纪念文集：为I.A.瑞恰兹而作》（纽约，1973）中巴兹尔·威利和燕卜苏的文章。

国文学。利维斯则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化理想。《细察》也许未被伦敦（甚至剑桥英文系^①）所承认，但很多曾在剑桥求学的作家、学者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走向思想感情的成熟的，其实际影响非发行量所能反映。诗人、批评家唐纳德·戴维一度将《细察》当圣经来读，而利维斯则被奉为先知。^②《细察》的成就在大洋彼岸也得到应有的注意。1948年，著名剧评家艾立克·本特立从历年的《细察》编选一册文集在美国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

在整理1932年到1948年间的《细察》时，请允许我说，我发现没有其他杂志刊载过如此众多有关文学的有用的分析。“有用的分析”指的就是那些能帮助你自己去理解作品的分析，当今充斥于我们图书馆的“批评”著作在这方面根本不行。^③

《细察》度过了二战的艰难，到了福利社会的和平时代反而无法维持。这份杂志自从创办以来一直没有专业的编务和营销经理，全靠利维斯夫妇勉力为之，编辑和作者从未领取分文报酬。^④为保持评论的独立性，《细察》和《现代文学记事》一样，宁可凿沉船只也不愿为堵塞大大小小的漏洞向赞助折腰。这种精神在一个已被商业化操作所麻醉的时代是难以理解的。幸运的是利维斯退休后剑

① 利维斯对剑桥英文系颇存芥蒂，数次发出“在剑桥但又置身于剑桥之外”的感叹。

② 详见布莱克·莫里森著《运动派：1950年代英国诗歌与小说》（牛津，1980）中第1章《运动派的起源》。

③ 本特立编，《〈细察〉的重要性》（纽约，1948），《序言》第26页。

④ 详见利维斯为《细察》最后一期撰写的《停刊词》，载利维斯编选《〈细察〉选集》，共两卷（剑桥，1969），第2卷，第317页至320页。利维斯在这篇短文末尾引用了亚瑟·休·克勒夫的名诗：“不要说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桥大学出版社重印《细察》(包括索引共20卷),此时英国各大学的英文系已取代了往昔的神学院和古典文学系,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心。

19世纪中叶,一些质疑圣经历史真实性的著作(如乔治·艾略特翻译的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先后问世,进化论也渐渐流行,宗教在英国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马修·阿诺德作于1880年的《论诗》一文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哪一种信条不发生动摇,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没被证明为值得怀疑,没有哪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受解体的威胁。”宗教的颓势一目了然,但是诗歌或文学的前途更为远大。阿诺德预言,人们发现“在不负自己崇高使命的诗里找到愈益值得依赖的依靠”;诗的效用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为我们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①这篇文章本是为5卷本的“英国诗人作品集”所作序言,文中的“诗”当然是指英国文学的精华英诗。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后,英语和英国文学更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和骄傲,英国文学则发展为大学里独立的学科。自从其产生之初,英文系和英国文学批评就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②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阿诺德的信徒。瑞恰兹进一步发展了阿诺德的观点:文化传统的崩溃将导致精神上的混乱状态,“诗可以拯救我们,它完全可能是克服混乱的工具。”^③但是瑞恰兹是从神经系统的平衡或满足来看待诗的作用,当他说诗的退化将造成生物学上的灾难或有害于人类的

① 《阿诺德散文全集》, R. H. 苏珀编(安阿柏, 1960—1977), 第9卷, 第161页。

② 这种使命感里也掺杂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成分。参看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牛津, 1983), 第1章《英文的兴起》; 克利斯·鲍狄克,《英国文学批评的社会使命: 1848—1932》(牛津, 1987)。

③ 瑞恰兹,《科学与诗》(伦敦, 1926), 第82页至83页。

心理健康时，他继承的实际上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宗祧。在 20 世纪的英国，像阿诺德那样以诗或文学为宗教的人是利维斯。就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而言，托·斯·艾略特绝对称得上早期利维斯的精神导师，但利维斯对艾略特的宗教信仰一直不以为然，他一生都力图将文学置于人文教育的核心，^①这也是阿诺德的一贯立场，虽然阿诺德所说的文学往往是古典文学；利维斯与斯诺的交锋实质上乃是阿诺德与托马斯·赫胥黎关于大学课程中文学与科学孰轻孰重之争的延续。^②文化是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共同信仰。

利维斯第一篇重要文章《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1930）^③以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一段文字为篇首引语：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韩敏中译文）

利维斯和阿诺德都怀疑煤炭和钢铁产量（或生产总值、消费水平）

① 利维斯，《教育与大学：英文学院概要》（剑桥，1943）；《英国文学在我们的时代与大学》（剑桥，1969）。艾略特也关心人文教育，但他想恢复的是宗教传统，他批评阿诺德不应以文化（文学）顶替宗教。

② 《科学与文化》是赫胥黎 1880 年在伯明翰的乔赛亚·梅森爵士科学学院（伯明翰大学前身）建院典礼上的演讲。赫胥黎认为就获致文化而言只涉科学的教育起码与只涉文学的教育同等有效。阿诺德在 1882 年的剑桥大学里德演讲《文学与科学》驳斥此说。他提出对美和行为操守的关心是生活意义所在，只有广义上的文学才能反映并促进这种关心。赫胥黎，《科学与文化及其他》（纽约，1882），第 12 页至 30 页；阿诺德，《阿诺德散文全集》，第 10 卷，第 53 页至 73 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诺的《两种文化》也是里德演讲（Rede Lecture）。

③ 该文最初以小册子出版，后收入利维斯文集《文化传承》（剑桥，1933），第 13 页至 46 页。

的提高能否用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幸福”，他们都不敢贸然站在急于投身社会改革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一边，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后者容易将自由和“更多的果酱”等手段与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但是两人心目中的文化有不尽一致的内涵。阿诺德心仪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也乐意用当代欧洲文化（如法国与德国的文化）为参照批判英国的陋习。利维斯独重本土资源（因此有时显得偏狭固执），时时追念未被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破坏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艺术。阿诺德的文化指内在精神的完美，利维斯则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化转变为一个语言问题。利维斯说，对文学艺术敏感而又有鉴别力的人是文化圣所的看护，他们数量很少，但却保存了传统中最不易察觉同时又最容易消亡的成分；高品质的生活取决于这少数人不成文的标准，文化的精粹就是这些人辨别优劣的语言。^①假如这语言的水准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庶几可望。艾兹拉·庞德在《如何阅读》（1928）中的一说颇得利维斯赞赏：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没有语言的健康就没有思想工具本身的整洁：

除了在造型艺术或数学中极个别的例子，没有词语，个人无法思想，无法交流思想，统治者和立法者也无法有效地制定法律。词语的坚实有效是由该死的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来照顾的，如果他们的作品腐烂了（我指的不是他们表达了不得体的思想），当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

① 《文化传承》，第15页。比较瑞恰兹：“有史以来文明就依靠言语，词语是我们相互之间、我们与历史之间的主要纽带，是我们精神遗产的通道。当传统的其他传播媒介如家庭和社区解体的时候，我们被迫愈益依赖语言。”《实践批评》（伦敦，1929），第320页至321页。

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教训。^①

阿诺德在评法国作家约瑟夫·儒贝尔的长文里有一个响亮的论断——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a criticism of life）。^②利维斯整个生涯都在证明这论断的正确性，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纯文学”和文学的超然独立性，他一再申说真正的文学兴趣也是对人生与社会的兴趣，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疆界。然而这种兴趣不是泛泛的、抽象的，不能停留在观念的或理论的层面上。^③“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利维斯 1982 年一本文集的书名）将眼光投向“纸上的词语”（words on the page），他认识到语言媒体不是用来表达现成的“观念”的，写作本身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风格特征反映了思想感情的品质。身处文化危机之中的利维斯企图在语言使用的习惯上寻求一个可靠的起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曾被我国学者讥为“唯语言论者”。他在二战期间应邀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提示他的听众：

对语言的微妙的地方没有敏锐的了解，对抽象或笼统的思想与人类经验的具体事物的关系没有透视力（只有有训练地经常阅读文学才能做到），那么，用于研究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就

① 庞德，《文学论文集》，托·斯·艾略特编并序，1954 年，简装本（伦敦，1960），第 21 页。利维斯的《如何教阅读》一文是对庞德此文回应，见《教育与大学》附录之二。

② 《阿诺德散文全集》，第 3 卷，第 209 页。阿诺德后来在《论诗》一文对此作了更全面的阐述。

③ 利维斯与雷纳·韦勒克就文学批评与哲学的关系展开过一场极有名的争论。见《〈细察〉的重要性》，第 23 页至 40 页。

没有它应有的尖锐性和力量。^①

不过在30年代初,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人们无暇顾及这看似浅显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风雨如晦,采取行动或作政治表态看起来更像当务之急。各种教条和宏大叙事在公共讲坛吸引听众和追随者,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美好前景的预言仿佛带来一片光明,很多知识界人士为之倾倒。像广告商那样自信大胆地使用语言成为一时风尚。利维斯既与托·斯·艾略特以及他主持的《标准》杂志所体现的保守主义(或曰新古典主义)保持距离,又不赞同激进派的政治立场。他也许过于天真地相信,文明的危机实质上是由批评不振所致,文学批评或语言分析是检验并确立价值的理想领域,一旦形成一批对语言十分敏感的读者大众,江湖骗子无以生存,这时大家的思想才明晰有力,社会改革也不致偏离正道。在创办《细察》时利维斯打出文学批评的旗号,拒绝作站队式的表白(避免站队也可以理解为站队的一种方式),但是他的文学批评始终也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②利维斯与当时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们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论争是值得扼要介绍的。

利维斯首先承认,人的精神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解决经济政治问题也有必要。当今的世界如此复杂,简单的处方或结论自然格外具有魅力。然而资本主义的抨击者有时无非是“好的资产阶级”,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迷信机器,断言资本主义生产的

① 这篇演讲收入利维斯文集《共同的追求》(伦敦,1952),已由徐育新译成中文,见《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共两册(北京,1962),上编,第129页。

② 详见《文化传承》中《“在哪个王上手下,老奴?”》一文。在利维斯与丹尼斯·汤普逊合著的《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训练》(伦敦,1933)一书中很多篇幅用于广告词分析。关于左翼人士对《细察》的批判见弗朗西斯·摩尔亨《〈细察〉的时刻》(伦敦,1979)。

驱动力是卑鄙自私的，但只有资本主义带来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才能将人类送入千年盛世。现在经常有人指责利维斯幼稚地相信永恒的人性，实际上利维斯对人性在环境压力下的脆弱深有感触。他说经济决定论者自相矛盾地假定，一旦外部条件改善了，即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安排更加合理了，文化的价值就自动光临人世，仿佛人身上美好的本性不可变更。爱德蒙·威尔逊曾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读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利维斯问道，当克莱德（小说主人公）经济上有了保障的时候他难道还没有把值得追求的人文价值忘得精光吗？文化传承需要人们积极参与，不能想当然地托付给虚构的历史潮流去照顾。^①

利维斯穷毕生精力在文学批评中锻炼心智，砥砺思想。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他在孤独地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斗争。电影、电视等传媒正在侵蚀、消解批评的标准，而大众似乎心甘情愿地被商业利益劫持了。他和纽曼一样竭力提高大学在当代文明中的地位，但他已不可能像纽曼那样乐观地描述大学的目标：“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为民众所喜提供真正的原则，为民众所望提供确切的目标……”^②利维斯对“民众所喜”和“民众所望”已不抱奢望。他以为早在17世纪后半叶，亦即班扬、马韦尔和哈里发克斯的时代，民众的文化与最优秀的文化还是统一的。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败坏了大众文明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利维斯慢慢像威廉·布莱克那样与时代潮流不合。他晚期演讲集书名“我的剑也不会”取自布莱克预言长诗《弥

① 见《文化传承》中的《序言：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传承》。

② 纽曼，《一所大学的设想》，1852，现代文化思想先驱丛书（纽约，1983），第157页。

尔顿》的《序诗》:

我不会停止精神上的斗争，
我的剑也不会手中酣睡，
直至我们在英格兰怡人的绿地上，
建立起耶路撒冷。

勇敢应战的背后似乎还隐伏着什么。

(三)

如果说利维斯的《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和《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确立了利维斯在诗歌批评方面的权威地位,那么《伟大的传统》(1948)是他小说批评的代表作。利维斯发现19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主要创作活力体现于小说写作,于是在40年代将批评注意力从诗歌转向小说,^①并将小说称为“戏剧性的诗歌”。

《伟大的传统》起势开门见山,首句就是毫不含糊的断语,利维斯的自信与锐气充乎字里行间。第一章的标题与书名相同,虽然总领全书,也可独立成篇。作者点评两百年来英国小说,阐述见解,批驳错谬,让读者感到一条传统的血脉清晰可见。这一章行文如钱江大潮,波澜层出,但恢宏(逼人)的气势后面只见一片诚挚热切之心,犀利的词语总伴随着细心的辨析和限制性的说明。

利维斯在执教与辅导的过程中发现,文学史上充斥了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经典”一词显然用得滥。他常说人生苦短,为充

^① 利维斯晚期也有出色的诗评,如《充满生气的原则:英文作为磨炼思想的学科》(伦敦,1975)中有篇幅可观的对托·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细读。

分利用时间学生读书不得不有所取舍，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作价值判断或重大的甄别，从而形成“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同时，对一些作家人们交口称赞，但对他们的真正卓越之处却缺乏共同的认识。^①形成这种“差别意识”也是达成共识的必要前提。阅读利维斯勾画的伟大传统，我们时时感到那传统像未经雕琢的宝石，大师之手让宝石的琢面放出异彩：以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戴·赫·劳伦斯形成一条发展之链。^②这些伟大的作家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艺术的潜能、人性的潜能、生活的潜能。虽然他们在技巧上都有很强的独创性，但形式并非主要目的。他们身上全无福楼拜式的对人生的厌倦，反之，他们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度。《伟大的传统》问世后，杰出的美国批评家屈瑞林在《纽约客》上评论道，批评家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描绘一个连贯的传统，从而使很多作品更容易理解”。书中有一些提法值得商榷，但“这是一流的批评判断，它的力量和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利维斯博士直言不讳的道德态度”。^③

① 也就是说，判断一致（如称某书、某作家伟大）是不够的，作出判断的依据也应该一致，只有这样，批评才是托·斯·艾略特所说的“共同的追求”。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和流言家对《红楼梦》齐声说好，但他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不同的内容。这种判断的一致有何意义？见《鲁迅全集》（北京，1982），第8卷，第145页。

② 利维斯把詹姆斯列入英国传统，也许会有异议。利维斯说詹姆斯从英国小说得到丰沛的营养，尤擅刻画英国文明的基本特征，他身上兼具英美两种文明之长，暧昧的身份使得他的观察更为敏锐。在评论美国文学时，利维斯肯定有“欧洲中心”之病。他强调美国优秀文学与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学的联系。在美国文学史上，他尊库柏、霍桑、梅尔维尔、马克·吐温，贬惠特曼、德莱塞、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详见利维斯文集《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伦敦，1967）中几篇关于美国文学的论文。

③ 屈瑞林，《利维斯博士与道德传统》，收入《读书偶得》（伦敦，1957），第101页至106页。

确实,“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往往有道德的出发点,他不会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一克莱武·贝尔那样标举出独立自足的“有意义的形式”。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奥斯丁《爱玛》的评论。利维斯不赞成从“审美”、“诗篇布局”和“生活之真”来阅读这部小说:“实际上,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位小说家对生活的独特兴趣的特点,而读者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领会小说的形式之美。”^①利维斯还把乔治·艾略特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进而为展开深刻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角度和勇气”,最终展现的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易言之,不论是技巧形式还是心理分析,只有在服务于道德意识的时候才有意义。这种关系亨利·詹姆斯一度处理得很好,他擅长模棱两可之笔,贯穿这技巧的是新英格兰社会风习赋予詹姆斯的“道德锋芒”或“洞察深远的道德睿智”。利维斯写道,詹姆斯“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文明感受力,一种能借助语调的抑扬和弦外之音的些许变化进行沟通交流的人性:微妙之处可以牵动整个复杂的道德体系,而洞察敏锐的回应则可显出一个重大的评价或抉择。”^②但是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迂回曲折的笔法和“肥大增生”的细腻使他丧失了道德触觉的准确性:

他对技巧的专注失去了平衡,技巧不是在有力地表达他最

① 读到利维斯这类文字屈瑞林发出“不亦快哉”之叹,但戴维·洛奇却在他颇有影响的《小说的艺术》(伦敦,1966)中把这一论断颠倒过来,称奥斯丁的道德关怀只能从形式之美来认识。见该书第68页。

② 请注意利维斯书中引用的《一位女士的画像》里沃伯顿勋爵为伊莎贝尔点蜡烛的细节。伊莎贝尔从这不易察觉的小事意识到她有自己体系和轨道,她的些许变化隐含了“重大的评价或抉择”——她最终拒绝了沃伯顿勋爵的求婚。